



花落春仍在

刘克敌 著



中国五十年变迁记

花落春仍在

刘克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花落春仍在

——吴宓与《学衡》

刘克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春仍在/刘克敌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8(文化与学术丛书)

ISBN 7-5059-4033-3

I. 花… II. 刘… III. 文化-理论-研究 IV.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238 号

书 名	花落春仍在
作 者	刘克敌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7.125
印 数	0001—1000 册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033-3/I·2612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徐中五

读了克敌同志这部付出许多心血、颇具新意的书稿，深有感触。对于《学衡》，对于吴宓先生，我所知不多，且未见过吴宓先生，没有专门研究，也不可能再来补课，倒是这部书增加了我不少知识。过去对《学衡》，因受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位当时论争文章的影响，确实留下顽强、保守的印象。白话文取得主流地位之后，《学衡》便很快被人淡忘了，梅光迪、吴宓等《学衡》健将虽也在几所大学教书，却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和声音。除老一辈某些学人还知道他们，一般人已不知他们为谁了。吴宓恐更寂寞、凄苦。当然，提倡新文化、激进的陈独秀大起终也大落，胡适则曾同时受到两岸不同极端的指责、批判。在过去的上个世纪中，即使不同程度当过战士，而若多半仍带有学者气质、耿介自守者，在两个极端的互相功伐中，处夹缝中均未有多少太平日子。也许自有定位，然一旦风浪袭来，即难免波及，而无法真正获得安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包括以后的冯友兰等，情况不尽相同，似大致近似。主客观干扰太多，静不下来，做不了更多学问，受不尽心情折磨，憔悴以终。

近年来读到过一些谈论《学衡》研究的文章，毕竟时代已有进步，对《学衡》当时的见解完全持否定调子的已经极少。《学衡》中某些见解也有建设性、可供借鉴考虑的一面。陈独秀倡导新文化，主张文学革命，支持白话文，当然对，而胡适也是主将之一。他们的主张受到不少攻击、质疑。对此，胡适毕竟学人气质较多，比较

客观、温和，听得进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有益。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陈给他回信，却如此凌厉决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当时以为陈独秀很武断，但是屈从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回想此事，仍认为陈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很容易引起反对的”（见其《容忍与自由》），显见不以为然。虽然后来白话已成正宗了，陈独秀已有激进政治家作风，胡适则还保持自由学者风度。陈当时尚无禁人不言的暴力，《学衡》诸人还是畅所欲言，非全是无理胡说。至于白话终成正宗，在理论上也并非全没有受到不同观点的影响而有些变化，成为正宗乃是经过质疑，形成合力的结果。胡适后来力辩提倡白话并不只起变换工具的作用，重要的是可以反对封建思想。诚然，有反封建、开民智的作用，但成了“正宗”的白话，不是至今在白话文里仍在大肆宣扬封建迷信专制的思想？可见当时对白话文作用的估计其实也有过高的地方。反封建的任务，决还未因白话已成正宗，而可高枕无忧了。不能简单地理解问题。

在大变革的时代，一时的混乱失衡，容易造成激进的武断态势，例如以专制反专制，从这一极端反到另一极端，而矫枉过正便难免出现，这可以理解，却不能视为经常的真理，为长久之计。何为经，何为权，在孔子《论语》中早有悟解。处境不同，当权者与受压者，政治家与学者，往往有所不同。陈、胡诸位与《学衡》诸人有小异，但不同程度都仍有学者气质，而在专制环境中，知识分子想望独立自由，从容论述，虽骨子里还是从良知、爱国出发，方法或

异,却总还是受苦的多。进而趋奉,退而隐论,均不可取,死更无益。孔子是决然还乡,授徒整理文化遗产,继续行仁。司马迁走的是含垢忍辱,完成其《史记》巨著,流传后世的道路。均未离本分,不失志士之风。

读克敌同志之书,感沧桑之变,距坦途尚远。有志研讨学人生命,应如何才得充分展现其价值,此书谈言微中,敏锐可喜。杂谈几句,无序之序而已。

2001年10月14日晨,上海

目 录

序 徐中玉

一、飞越沧桑

- 从国学热看《学衡》派的历史命运 1
 梅光迪把胡适“逼上梁山” 9
 神圣的允诺 15
 第一声不谐和音 22
 《学衡》的“保姆” 27
 学贯中西、地分南北 31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34

二、盗火者与守望者

- “中体西用”的是非功过 37
 哈佛三杰与《学衡》 42
 “只要有我吴宓在，文言文就废不了” 48
 陈寅恪的冷眼旁观 54
 《学衡》聘请的洋教练 61
 墙内开花墙外香 66
 妙玉乎，紫鹃乎？ 70
 柳诒徵力撰《中国文化史》 76
 陈寅恪苛评《红楼梦》 82

三、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

陈寅恪大宴东方楼	87
生死之交两吴生	92
梅光迪说多做少	98
王国维的辫子与自杀	102
“心事落花寄，谁能识此情”	111
二马之喻与骡马情结	115
陈寅恪“冷说”爱情	119
吴雨僧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123
关东大侠诗人王荫南	130
占卜与学者的命运	135
大学者要写“大小说”	139
陈寅恪受命拟成家 吴雨僧热心做冰人	144
“爱君深亦负君多”	149
才女琴慧与她的《留美漫记》	169
吴宓的自杀情结	173
陈寅恪妙对难后生	178
多才多艺的柳翼谋	190

四、身后是非任评说

鲁迅嬉笑怒骂“估”《学衡》	194
吴宓真诚赞《子夜》	198
胡适之的打油诗	201
发自赞同者的声音	206
《大公报》增办副刊，吴雨僧分身有术	21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13
虽是自家人，也有红脸时	219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224
附录一 《学衡》杂志简章	229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231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不是后记的后记	233

一、飞越沧桑

从国学热看《学衡》派的历史命运

命运握在手中，脚下是不可更改的旅程。

——题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对于国学研究的重视。在整个二十世纪期间，这应该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五四之后到三十年代）也是最后的一次“国学热”。与此相应的是对近代和现代史上过去很少涉及或虽有涉及但评价不当的一些人物、团体和出版物，重新进行评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例子，即是对《学衡》这个杂志以及有关人物历史地位的价值重估，一时间重估《学衡》成为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这些本已成为历史的人与事为何又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些类似出土文物的历史人物的再次引起世人关注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显而易见的回答是，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的人们，已经具备了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现实生活和未来的发展，也急需

人们对历史重新给予解释,以使人们尽快放下重负,轻装前进,以自由的心态进入新的世纪。此外,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与命运,也往往在这些曾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物和社团那里,得到更有代表性的表现,为此,也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再研究和再审视,以便能够从他们的思想观点和个人命运中,发见值得人们深思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问题,如何重建现代中国文化并使其重现辉煌等等。

历史将会证明,1927年王国维的自沉,在人们书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时必将占据一个重要地位。对于他的自杀,也许至今人们还有不同看法,但他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其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却早已把王国维之死与中国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而且,陈寅恪从历史上为王国维找到了其先行者,即伟大的诗人屈原。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十分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只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杀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无独有偶,在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永久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地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拔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原因,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

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廷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事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王国维也许找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更使他恐惧绝望，于是他甘愿去殉那正在衰亡的文化。不能说他们的死没有价值，但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始终无法摆脱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该如何为自身定位？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只有这样几条出路：为王师、为王臣和为王之阶下囚，当然还有一条：为隐士。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怎能真正地“隐”下去？说到底，文人之为文人，其使命难道不应体现于从文而体现于从政？为何在中国少有一心从文拒绝从政的文人？为何纵有极少数专心于创作与学术者，却又难保其身心的安宁？至于那些归隐者，其作品为何又多多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气息？

自然，还是有甘于寂寞专心学术者，例如陈寅恪和《学衡》诸人。不过他们的行为并不能使他们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得不到安宁。拿《学衡》诸人来说，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专心学术，充其量不过是企望以自己所学为处于变化中的祖国提供一些可以具体操作的思路，但获得的回报竟然是长达数十年的批判，以及批判之后的被打入冷宫。

正是王国维之死，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命运问题，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并进而有所贡献于人类的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吴宓等人面前。面对现实，王国维的选择是专心治学，陈寅恪他们本也已如此，但王氏之自杀却迫使他们意识到，即使个人想安于书斋，现实却未必会给你这种可能。也是在王国维自杀后不久，陈寅恪甚至与吴宓讨论过如果连大学也呆不下去，他们又该怎样生存的问题。显然，他们不可能做一个奴性十足的文人，更不能简单地步王国维之后尘，而且王国维的临终遗嘱已经赋予陈寅恪、吴宓等更艰难的使命，即他有责任也有能

力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王国维之后的文人寻找摆脱绝望、重新确立人生信念的坐标。陈寅恪没有辜负王国维的嘱托,不久,即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社会定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最重要一点,即他明确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基本原则:“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时过二十四年,陈寅恪在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终其一生,陈寅恪不仅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而且以此为准绳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严格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方面缺少独立性,以至会在时代社会变迁中出现随波逐流甚至曲学阿世之徒,而少数特立独行者,则又常遭迫害,沦为被放逐者,被拒于社会主流之外,没有发出声音的任何权利。对此,陈寅恪首先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出现的“拙者巧者”的分化现象:“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

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在陈寅恪看来，屈原、王国维等（也包括他自己）以及《学衡》派诸人就是这样的“贤者拙者”，他们过于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善于也不愿意随波逐流，那就自然会常常感到痛苦，终于为世俗迫害消灭。据此，陈寅恪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倘若良知仍在，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况，都应毫不犹豫地拒绝向庸俗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好友杨树达先生的潜心治学给予极高的评价：“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其实陈寅恪自己也正是如此，其“壁立千仞之态度”，（吴宓语）已经赢得无数后学者的敬仰。而且陈寅恪的这一态度中蕴涵有极为复杂的情感，特别是百年来的家国兴亡之痛，更使他深深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安身之地，恐怕也只有学术而已。从政固然有时可以名利双收，但为此付出丧失个人独立人格的代价，却是非常可悲的。而所谓专心致志地搞文学创作，似乎可以无关乎政治，但在任何一个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的社会中都是不会允许有真正之创造自由的。相形之下，也就只有治学可以视为文人最后

的归宿,虽然这一点事实上也无法保证。不过在陈寅恪看来,无论怎样的寂寞与贫穷,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而且必须在治学中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为此应当准备用生命来捍卫。

那么,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抗拒外界的巨大压力而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陈寅恪主要强调了两点。首先,他极为重视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文人思想修养与品行情操的影响:“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陈寅恪认为,中国历史上多动乱年代,此时政权不稳,统治不力,社会道德伦理易出现混乱,而官修之学此时往往又被弃不能对社会风气发生影响,故名门士族之家风私学反而可保留继承其优美门风和学术。陈寅恪指出,所谓士族,当初其家族之始并非以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唯一表徵,而更重要的是其家学与礼法不同于他人。对此他引《旧唐书》中《袁朗传》为证,其考证限于篇幅不再引,其实陈寅恪之家世即为最好的说明,一门数杰,各自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其次,陈寅恪认为知识分子要坚持其独立精神,关键还在于个人的情操修养,内心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使命感。他曾以唐代牛李二党之争时李商隐与柳仲郢之不同命运作为比较,说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不可或缺也。”李商隐处于牛李二党之争的夹缝中,终生多遭变故,自然令人同情,但造成其如此状况原因,实与其个人品行有关。原来李商隐本出自新兴阶级,按理应属于牛党,才算合乎当时社会道德,但他却与李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结果不仅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在李党也认为此人轻薄无操。如此牛李二党均视其为重利轻义之小人,李商隐又怎能不沦为二党之争的牺牲品呢?相形之下,同时代的柳仲郢虽然也是处于牛李二党之间,却能获得二党的共同尊重,原因何

在？陈寅恪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原来柳氏出身虽为旧门，却非名门望族，独家风修整，言行颇受人们尊重，因此得到牛僧孺的褒奖与重用，自然算作牛党。但终因其家门及其本身品行端正，终于得到一向尊尚门风家学之李党的谅解，所以他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终致显达。在此，陈寅恪虽然是以历史人物为例分析，但其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商隐式的人物是不少的。而且无论品行怎样，李商隐毕竟是一个天才诗人，比起今日那些既无才情、更无气节的所谓“知识精英”来，他至少留给后人不少优秀的诗篇。那么，我们的“精英”又能留给后人什么呢？

与陈寅恪相同，《学衡》派诸人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忧虑，出于对从古至今历代文人命运的思考，结合他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但事实是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当时对《学衡》提出的观点，主流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采取全盘否定之态度的。而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又似乎并不需要他们开出的药方，民族救亡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支配一切的首要使命，为此可以采纳一切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使用一切有可能生效的措施。至于其副作用和衍生的弊病，一时也意识不到同时也顾不上去管。应当承认，这在当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不过，按照《学衡》诸人的意见，则首先是在前进的同时不要忘记纠偏，尽可能不要留下太多的后遗症；其次对于到达未来的途径也许不止一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选择，那又何乐而不为？

可惜，《学衡》派的意见在当时不但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反而受到批判。这本身就在昭示着一种危险的可能，即对于异端的断然排斥甚至予以彻底消灭的态度。而追根究底，这种态度既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有关，也与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引进有关。于是问题的提出就很自然了：既然同为接受西方文化者，为何《学衡》派